

读天下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迷失

张鸣

中国1917年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点像押宝。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宝算押着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了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

跻身战胜国之列, 国人群情振奋

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据胡适回忆,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3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一班儿教授,做了1天的对民众的演讲。

第一次跻身战胜国之列的国人,对“战胜”和“公理”很有期待,战胜已经变成了事实,我们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14点声明,最令人鼓舞的两点是:一、废除秘密外交;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此论一出,不管威尔逊动机如何,弱小国家欢欣鼓舞,中国人也是相当兴奋。

中国人满以为,经此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路,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台湾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个河南的中学生,他回忆道,当时开封举行庆祝大会,学生差不多都来了,大家心里充满了快乐。不仅学生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因此,中国对巴黎和会同样期待甚高,听闻与会国参会代表有3个等级,5人、3人和2人,中国似乎都想就派出了2人。

弱国无外交, 占理却讨不到半分便宜

要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实际贡献,中国并不小。毕竟有几十万华工在欧洲战场做苦力,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资,抬伤员,相当于中国派遣了一支几十万之众的后勤部队。但当时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新世界”,依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所谓的公理、正义,不过是好听的外交辞令,巴



顾维钧,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之一。

黎和会是个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会议,但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要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制定的。中国跟多数殖民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在和会上的命运,如同是砧板上的鱼肉,所差的无非是切给谁而已。

可是,前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人,以及中国的知识界中人,对和会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连老于世故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都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当然地在和会上名列第一等级,有5位代表。未加细想,就派出来5位正式代表。可是,当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会议开始之后,若干国家经过力争,全权代表人数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均增加1席,但“中国仍属向隅”。这让中国很没面子,也一度让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很为难。代表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5人轮流出席,中国代表团的名次顺序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组。由于陆徵祥的身体不好,实际上最有才华的留美学生顾维钧,成了事实上的首席代表,这对中国人在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大为有利。可惜,弱国无外交,在会上占理,却在实际中讨不到半分便宜。

尽管一上来就吃了瘪,脸面无存,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想在和会上

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为此,代表团各个成员还分头备课,写出备忘录。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底线是解决山东问题。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能据理力争的也只有山东问题。

1919年1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一度使这个问题闪现出一丝曙光。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山东的历史讲起,三言两语就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认为和会理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则相形见绌,不但口音过重,还有点含混不清,估计不少与会者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所以,双方发言过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而日本人则被冷落在一边,情形颇为尴尬。

可惜,巴黎和会不是公平的辩论赛,大家都是来做交易分糖果的。尽管欧洲列强跟日本有矛盾,但鉴于日本的实力,绝没人愿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5强之中,最强的英、法、美3国,法国一向对华不友好,此番和会,与会会的法国总理自始至终对中国态度恶劣。美国人在实质上也更倾向于日本。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会上,虽然反复强调公理和正



巴黎凡尔赛宫镜厅,巴黎和会举行签字仪式的地方。

义,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可惜,他的这种秩序是要靠建立国际联盟来实现的,而建立这个联盟,必须得到5大国之一日本的支持。因此,只要日本坚持非要山东不可,美国人势必只能答应。

对美国人仍满怀期待, 恨只恨自家

所以,在那一瞬间的曙光过后,在巴黎的中国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留学生和侨民,还有一个自费到巴黎“观会”的梁启超,统统感到暗无天日。

最后,美国人找到一个借口,为自己的背信开脱,这个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这个换文,是在日本的压力和“善意”下,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承认了日本对于胶济铁路的权利。代表中方签字的章宗祥,在换文中例行“欣然同意”字样。据王芸生的《六十年来的中国》所记载的陆徵祥1919年4月22日电文,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质问:1918年9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强,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更耐人寻味的是,后来出版的反映这段历史的《秘笈录存》在收录了陆徵祥这份电报之后,随即附上了一份“某要人欧洲来电”,这个某要人明显是指梁启超。这个欧洲来电非常明确地说,1918年的中日换文,被西方误以为是中国为二十一条“加以保证”,所以,“惟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于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该书在收录这篇电文的背后,还加了一句按语:“此时舆论咸归咎于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遂在北京发生‘五四’之变。”这个电文跟《梁任公先生

年谱长编初稿》所载的有点儿区别,但有这份电报,而且把和会上中国的失败,归罪于“一、二”订约之人,的确是实情。于是,接到电报的梁的儿女亲家林长民,随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报》上披露了梁的电报内容,直接点燃了“五四”的游行示威。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订,林长民在此时,通过国务院方面,探听到中国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东权益的情况下,也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遂自撰《山东危矣》一篇,命随员连夜送往《晨报》刊布。有意思的是,在后来“五四”中被火烧的曹汝霖看来,林长民这样做,无非就是因为林曾经借钱于他,受到了怠慢,思以报复。

其实,不仅梁启超、林长民们对美国人满怀期待,恨只恨自家。“五四”闹起来的学生们,对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依然有感情,不仅有感情而且还有期待,大游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书。可惜美国公使施芮恩那天恰好不在,一腔怒火的学生才转而奔了赵家楼。甚至在“五四”游行过去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在长沙办《湘江评论》,还把法国总理克雷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日本代表牧野男爵都说成是强盗,而对威尔逊网开一面,说他被坏人包围了,很可怜,云云。

无论学生闹不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都是不可挽回的。面对国内汹汹的民情,中国代表所能做的也只剩下拒绝签字了。事实上,也只能拒绝签字,因为即使没有留法学生的包围,中国使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在和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五四”运动激起的民意,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其实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其实1919年的中国,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有了变化。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开始怀柔,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至少在口头上说今后还要还给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处,两国的租界收回了,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也收回来了。但是,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是受挫挫感最强的时刻,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这样的运动,而恰恰在4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现这样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

(摘自《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中国藏族文化年鉴》编纂工作启动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藏族文化年鉴》编写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此举标志着此年鉴的整体编辑工作正式启动,以及我国首部年度大型藏族文化工具书即将问世。

据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院长才让太介绍,《中国藏族文化年鉴》主要内容有“编年卷”“理论卷”“人物卷”“机构卷”“艺术卷”

《中国古戏台研究与保护》出版

本报讯 对我国古戏台进行综合研究的艺术科研成果《中国古戏台研究与保护》近日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该书首次集中公布的一批罕见的宋元戏台及其演戏图像、清代戏台及其演戏的照片、外国画家200多年前绘制的戏台及其演戏的图画,我国最早研究古戏台

“唐卡艺术作品展”亮相上图

本报讯 (记者李静)为宣传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弘扬优秀的民间艺术,近日,由上海图书馆和青海省图书馆共同主办的“青藏高原的奇葩——唐卡艺术作品展”在上海图书馆拉开帷幕,共展出60余幅作品。

上海图书馆和青海省图书馆近年来在展览资源共享领域有着

《战时中国对日政策研究(1937—1945)》

该书通过考察战时中国对日政策的形成、演变全过程,总结出战时中国对日政策具有立足于抗战,一切为了抗战,是抗战的对日政策;包含了国共两党的战时对日政策;争取国际援助,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各国联手制日;坚持持久抗战四大特点,并指出这四大特点是历史和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产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胡德坤 彭敦文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谁在误读中国——央视名嘴杨锐纵论天下》

央视著名英语节目主持人杨锐新作《谁在误读中国——央视名嘴杨锐纵论天下》近日出版。杨锐在央视工作20多年,是央视英语频道创办人之一。他代表央视采访了克林顿、卡特、布莱尔、撒切尔夫人等多位外国政要。该书收录了他50余篇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政论与随笔。对于此书,《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杨瑞春如此评价:“杨锐是一位咄咄逼人的发问者,又是一位犀利的评论者。他的文字始终坚持着一个新闻记者的温情怀。”

(杨锐 著 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往事回首》

刘丽英,上个世纪70年代末由辽宁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岗位调到中央纪委工作,先后担任审理林彪、江青“两案”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央纪委常委、副书记等职,参与了刘、林、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工作。她还具体参与和领导查办了一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其中有倪献策案、丛福奎受贿案等一批大案要案。该书为刘丽英撰写的回忆录,记述了她到中央纪委工作之前鲜为人知的工作、生活经历,同时也从个人的角度,折射出党和国家一段风雨兼程的历史。

(刘丽英 著 新华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连环画》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连环画》(全套29本)最近隆重上市,为青少年中普及历史知识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也为广大连环画爱好者提供了一套收藏佳品。上自三皇五帝,下至大清王朝的覆灭,该书用五彩缤纷的连环画将2000多年的历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它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全彩连环画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的通俗读物。

这套连环画是由文字语言学家王良根据蔡东藩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改编而来。原著自上个世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海内外知名人士的推崇。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建议党内高级干部应该好好阅读它,以了解中国历史。这套连环画,是由天津漫画家卢定兴倾注8年时间,倾心描绘完成,又经10多位美工人员花费近1年时间精心修饰完成的。

(王良 改编 京华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向宇宙下订单》

一部在写作之初只是作者与朋友分享的私人手稿,一经出版,立即成为德国的畅销书。出版10余年来,该手稿被翻译成了14种语言,这部手稿就是德国作家贝波儿·摩尔的《向宇宙下订单》。

《向宇宙下订单》对近年来炒得火热但又看似高深的“吸引力法则”,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进行了平民化的解读,使得它自1998年出版以来,至今依然高居德国亚马逊书店励志思考类图书的第一名。

(德)贝波儿·摩尔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求职,从大一开始》

5年前,覃彪喜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写的《读大学,究竟读什么》,以其切实可行的指导性在大学生中风靡一时。近日,覃彪喜新书《求职,从大一开始》又与读者见面了。

随着大学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成为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成了所有大学生在入学之初就要考虑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言,“决定面试结果的并不是面试那十几分钟,而是整个大学四年”。一个大学生在毕业求职的时候有多大的竞争力,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取决于整个大学四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求职这场战役从大一入学就已经打响了。要想毕业时能够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从大一开始就做好职业规划,明确目标。

(覃彪喜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拾音阁

当代文学的一面镜子

——读章仲锷《磨稿斋拾遗》有感

柯云路

在我国当代文学界,章仲锷算得上家喻户晓,这名头的由来大多是因为他是一位卓越的编辑家。在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经章仲锷亲手编发的作品数不胜数,他也因此很早就被誉为京城的“四大名编”之一。

章仲锷不单是一个编辑家,还是一个写手。2009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章仲锷的《磨稿斋拾遗》(上下),共100多万字。厚厚的两卷书以作品类别分为“编余杂谈”“文评集纳”“同渡之行”“忧天怆地”等部分,共收集了章仲锷各个时期的作品几百篇。

先说磨稿斋的来历。章仲锷当年与老作家秦兆阳在《当代》共事时曾获赠一首诗:“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依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秦老的首首诗深得章仲锷喜爱,遂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磨稿斋。毫不夸张地说,章仲锷的人生是在磨稿中度过的。

“编余杂谈”汇集了他与作家们的交往和故事。在《作嫁与作家》中,他回忆了与邓友梅、从维熙、王蒙、刘绍棠的友情。他们当年为何被称为“四小天鹅”,作者怎样在他们被搞去“右派”帽子后一一编发他们的稿件。文章不仅评价作品,亦写到作家们的不同性格,包括他怎样给从维熙改错别字,怎样去邓友梅冷寂的斗室约稿,又怎样坐在刘绍棠乡下的火炕上讨论小说构思。生动有趣的文字使人们了

解了当年的文坛风貌和编辑怎样与作家合作。

在《面对退稿》中,章仲锷指出,没有一个作者没经历过退稿的考验和困扰。对待退稿首先是不愠,有几篇退稿乃平常事,没必要影响情绪;从退稿中领悟自身的不足,才能有所进步。又说,有的作家硬是从几百篇退稿中摔打出来的。虚心地对退稿的意见,该修改的修改,“枪毙”的重来,要成功,这确是一条坎坷的必由之路。相信这些话对于有志于文学的年轻人不仅是告诫,更是鼓励。

在《不悔》中,章仲锷谈到文学的边缘化,在了一项受欢迎的十大报刊评比中,榜上有名的竟无一本文学杂志,章仲锷感慨道:不趁时,不媚俗,不屈从,不合流,把文学视同生命,傲然挺直脊梁,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表现了他的情操和志向。

“同渡之什”是全书最温馨的一组文字。《当我自由酣畅地呼吸着》一文中,作者回忆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儿子怎样骑着作者的自行车从广场围捕的罗网中冲出来,却发现自行车的绿色塑料牌不见了。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丢失的塑料车牌可能惹来大祸。作者初始忧心忡忡,担心儿子遭遇不测并累及全家。所幸有惊无险,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的愤懑和忧虑。

妻子高桦的金婚礼物。他和高桦在“文革”前后曾两地分居11年,是妻子凝聚和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四口之家。作者身体一直不好,曾数次重病,切了大半个胃,患上肝硬化,又有冠心病,是妻子求医问药、护理照料,才得以年过古稀。面对妻子斑斑白发和劳损变形的腰腿,章仲锷真情自责:“老伴啊,我欠你太多太多!”

章仲锷先后供职于《十月》《当代》《文学四季》和《中国作家》。他说,如果把人生比作旅途,它们就是一个个驿站;比作征程,它们就是一个个关隘。这是个漫长、紧张而又艰辛的工作历程,我把最成熟的年华献给这项事业。回顾这段历程,我与新时期文学前行的足迹同步,功过得失,任人评说;个中甘苦,惟有自知。

他是一位睿智长者,眼光犀利,但性情温和,虽有独特见解,却从不强加于人。许多作家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过恩惠,但他始终保持平和心态,从不要求任何回报。章仲锷说:“在文学圈里待了这许多年,阅人可谓多矣。我接触的作家,最初大都籍籍无名,因而更显示真面目。我写得多是这时对他们的印象。在我眼中,谁都不容易,所以,我的笔是温馨和善意的。希望能够写出一些作家的侧影,为文坛留下某些轶闻和史料。”

《磨稿斋拾遗》2009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